



与创作同声息 与时代共脉搏

—四十年理论批评发展述要

□白 烨

理论批评作为文学活动的重要构成,具有着解读作家作品,促动文学创作,影响文学思想和思潮,推动文学的传播、接受与阅读的多重功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钩玄提要地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

在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发展中,理论批评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是此起彼伏的理论争鸣,推动了文学领域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是文学批评的奔走呼号,护佑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创作倾向的一路前行;是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的跟踪考察与持续评说,推动了一批精品力作走向经典化;是文学理论批评不断观察新倾向,深入探究新动向,促进了整体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在这样一个与创作密切互动、与时代同步前行的过程中,文学理论批评也在不断完善自身建设与学科建构。可以说,理论批评的如许历程与不凡实绩,本身即是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重要收获与主要成就。

为新人新作新追求鸣锣开道

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头几年,文艺界百废待兴,乍暖还寒。理论批评适应平反冤假错案、批判极左路线的需要,一方面以观点辨析、理论批判的方式,着力清算“四人帮”及其极左思想路线的文艺流毒,一方面以“共同美”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等系列文学论争,深入开展文艺理论思想的拨乱反正。经由这样双管齐下的理论批评工作,文艺界的环境氛围逐步回归正常状态,理论批评自身也获得了重新出发的蓬勃活力。

人们通常把一些文学倾向只看作是创作现象,实际上一种文学倾向得以命名,得到彰显,也是理论批评命名与阐说的产物。新时期之初,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作品刚一发表出来,理论批评家就从中看出这些作品所蕴含的揭露“文革”创伤、反思左倾后果的思想倾向,在人们为之震惊又尚在迟疑之时,以及时而犀利的评论文章给予了旗帜鲜明的支持。如陈荒煤的《〈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冯牧的《关于〈班主任〉及其他》等文章。这些文章在力排众议,力荐新作的同时,实际上也引发了有关“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命名与研讨,推动了文艺创作的观念突破与艺术创新。

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展与深化,闭关锁国的状态得以根本改变,国外的文学文化思潮日益进入国内的文艺领域,并对文艺创作、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这时,一些领风气之先的作家在创作中开始尝试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某些手法写作小说,一度引起较大争议,如王蒙借鉴“意识流”手法写作的短篇小说,徐敬亚等人借鉴“象征派”手法写作诗歌等。理论批评界就此先后掀起“现代派倾向”问题、“新的美学原则”等问题的研究与争论。虽然意见颇显纷纭,甚至相持不下,但大家都力求超越意识形态的框架,从艺术形式的“洋为中用”上去认识问题和讨论问题,这使得现代主义文学元素逐渐融入当代文学,成为创作中常态现象。也是由于理论批评的拓展与助动,“先锋派”文学、“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等新的写作倾向纷至沓来,源源不绝,使得文学创作日益打破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走向多元化的发展道路。

以文学评论的方式扶持新人,品评新作,在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还表现为对“新生代”作家群、“70年代作家群”、“80后作家群”的关注与推介,以及对“新写实”、“底层写作”、“现实主义回归”等创作倾向的观察与论析,这种与创作现状密切互动的文学评论,实际上起到了为文学新秀鼓劲,为创新倾向扬帆的功用,使得文学创作以新潮迭起的形态,不断奋勇向前。

在关注倾向、批评偏向中激浊扬清

看似个体性的文学创作,因既与社会思潮相联系,又与审美取向相呼应,常常会在分散的状态中,显现出某些群体性倾向与思潮性动向,从而对整体的文学创作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因此,在品评具体作家作品的同时,关注某些倾向,研判某些动向,乃至批评某些偏向,就成为理论批评界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新时期发轫之初及20世纪80年代,文学既面临着社会现状的诸多问题,自身也在复杂的境况中寻索前进的路向。

“边地文化”与“文明等级”

—评金春平《边地文化与中国西部小说研究》

□丁 帆

这是一个被文学创作界和文学研究界所边缘化的一个领域,而这个文学的“富矿”被冷落,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巨大损失。面对这样的窘境,我们应该承担起责任,我以为,只有首先让文学研究者高度重视起来,指出其文学史的意义和审美意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领域的难题。所以,我要在这里疾呼:请不要忽略中国文学最具表现力的文学场域——在两万两千公里的边疆区域内,“边地文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生长的空间,它将成为中国文学书写的沃土,也将成为中国文学与现代文明拉开距离的最佳视点,必将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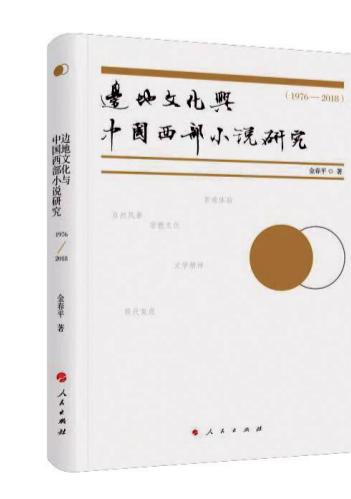
所谓“边地”,乃边疆之谓也,“边地文化”便隐含着以下几层意涵。首先,它隐含的是国家地理的内涵,在与他国接壤的土地上所产生的文化和文学,必然会带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冲突,无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还是国别疆土上的分歧,都会对文化和文学带来差异性,造成与内陆文化和文学的落差,这也正是文学创作最有“异域情调”的富矿所在。其次,它隐含着的是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多元性元素,这种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当然,也包括宗教文化的差异性效应,都是在多个民族文化“差序格局”之中各自形成了多圈的涟漪效应,这些层层叠叠涟漪交合,恰恰又是文学最好的审美场域和描写对象,这也是迥异于内陆文学题材和审美异趣之处。缘于此,只要有比较文化审美视野的作家是一定会将之作为至宝一样收纳其创作宝库的。再者,其独特的文明语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饶的创作素材,如果抛开人类文明进程的价值优劣的进化论观念,单单从文明的形态给予文学创作的审美价值来看,窃以为,那种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给文学审美带来的吸引力则更加巨大和惊艳,因为读者的审美期待视野是建立在“生活在别处”的,异域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是吸引全世界只要有“求异审美”眼光游历者的文学风景线。鉴于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有文化和文学意味的选题,但是如何做好这个大题目,却是中国新文学百年来最大的困惑和难题,金春平始终想动这块文学边缘的奶酪,最终还是吞下了,至于消化得如何,还是大有说法的。

《边地文化与中国西部小说研究》一

书,截取的时间和空间就决定了它的涵盖面。从1976年至2018年,这42年间所发生的“边地文化”冲突给文学带来了无限的再现和表现空间,我们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有无达到一个空前发掘富矿,使之繁荣的境界,我们的文学研究有无达到认知富矿的文学史意义和地位,使之成为一个有较高显示度的研究领域,都是有待于解决的难题。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边地文学”和“西部文学”,我以為是十分欠缺的,金春平的这种系统性的研究作为一种门类的研究,就显得意义重大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论者生活的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他无法把中国广阔无垠的边疆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故而只能选择“西部”这个地理空间来分析其42年来的得与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金春平的终极目的是:“以边地文化为研究视角,力图从地域自然、宗教文化、苦难生存、现代性焦虑等方面,探讨西部作家对边地文化因素的不同叙事策略,以及这种地域文化的文学书写

在新时期以来所呈现出的文学史价值。西部小说的地域特色包含了稳定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地域自然是构成西部小说的背景空间,且在西部小说中具有隐喻化和象征化的叙事主体角色功能、浪漫型自然所隐喻的人格特征、对立型自然所隐喻的人的本质力量、动物形象所隐喻的人性与生命内涵,以及西部生态理念的生成形塑,都体现出西部小说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先锋性和人性化的普世化思想美学构建。宗教文化之于西部少数民族文学,不仅是美学符号和审美意象所构筑的审美空间的艺术拓展,还在于宗教文化以其特殊的文化理念和宗教思维赋予西部小说以内在于指向哲思。这都是西部小说的民族性独异于非宗教小说的重要文化表征。西部小说的苦难体验主题,由于西部边地与中东部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发展的差异性而显得异常沉重和普遍,苦难从日常生活、历史记忆和文化生存等方面构成了西部民众的外迫性力量,



而超脱苦难境遇的生存姿态以及在消解中所形成的集体民族性格,也构成西部小说拯救苦难的文化理念模式。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西部边地进入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明同时演绎的历史境遇,面对这一时代性难题,西部作家集体性陷入了对现代性认知的悖论当中,这种焦虑不仅体现为作家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分化,表现在对乡村、都市以及乡村都市化和都市返乡化的不同价值判断上,还包括民族作家对现代性与民族性冲突的生存体验差异,造成西部小说本土化叙事的集体困境。论著以中国文学主潮流为评价坐标,总结和反思着西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报告文学领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篇章,有呼唤尊重科学知识的《哥德巴赫猜想》,有《抗日战争》这种战争题材的作品,有反映重大工程建设的作品《走出地球村》等,可以说,凡是重大事件几乎都有人写到了。惟一缺憾的是,对改革开放40年的这场工业革命,缺少一部立体的、总结性的著作。

穿越40年的时光隧道,工业企业题材报告文学正步入一个辉煌的新时代。

伟大时代应该出现伟大的作品。改革开放40年最主要的精神动力就是创新。报告文学在这样的伟大时代里,是使命文学、担当文学,更是与企业命运、国家命运、人民命运共繁荣、共发展的文学,是波澜壮阔时代巨变的呈现,是纷纭复杂的世情人心的描述。

工业企业报告文学在当下中国经济、文化发展中发挥着特别作用。

工业企业报告文学要突破“不好出版,不好发行”的局面,作家要有“踏破铁鞋”的精神,要有深入细致开掘的钻劲儿,才能找到最有表现价值的角度,才能找到最能展示社会生活本质和时代精神的切口。这就需要作家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采访,深入生活一线,深入被采访者的内心。同时,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面对大量的现实材料,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应该像匠人那样,以真实的素材、艺术的方法雕琢作品。要懂得取舍、剪裁,既要表现其真实性的一面,又要体现其艺术魅力,使作品得以高于生活的方式呈现。

当下某些作者,以走马观花式的形式体验生活,将材料统统拿走了事,既不潜入生活的深水区,又无感人的文笔,作品呈现不了历史的厚重、现实的丰富。那些不为生活所动的作家,只能说还浮在生活的表面,缺少大格调、大情怀、大气魄,他轻慢了生活,生活也会反过来轻慢他的作品,这就是作家写作的辩证法。

独特的题材可以成就文学作品的高度,形成诱惑力和感召力。读者对工业企业或许了解一些,但大多数人不熟悉,如航天、石油化工,这样的题材具有诱惑力,如果将其植入报告文学中会产生难得一遇的新鲜感和可读性。无论是普通的工人还是企业家,都首先是人,作家的笔触要充满对写作对象的热爱、激情和渴望,这样才能写出有激情的作品。

工业企业报告文学要想成为“传得开、叫得响、留得住”的作品,必须从人性的角度抒发情感。很多文学作品,往往是写人情,写家长里短,写所谓的“伟大业绩”,但极少触及写作对象的灵魂深处,导致作品读来平平,没有深刻的感受。

当下的作家不乏发表作品的阵地,报纸杂志特别是网络足以让作品“横行天下”,作家也不缺乏想象力,坐在书斋里海阔天空,作家同样也不缺乏“生活原型”。那么当下的作家还缺乏什么呢?缺少付出,应该潜入到生活中、人民群众中体验真实的生活,让自己的作品拥有纯净温暖的情怀。

一位经历了改革全过程的企业家曾经这样说:“改革之路的艰难过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过程,目前为止很少有人去详细记录。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对这段历史进程中的诸多波折,有少数人一知半解,大多数并不清楚。而作们,年长一些的,写这样的大题材已力不从心,年轻一些的,没有经历过这段浩浩荡荡的历史无从下手;即使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作家,因不懂企业、不懂经济,难以驾驭工业题材而怯步。我多么希望看到一部以现代人的视角切入,但又将中国改革开放放在历史和世界的大背景下,描写、抒写这个时代,抒写那些为中国改革开放贡献智慧、勇气、青春乃至生命的,特别是当下仍然活跃在新时代前进路上的企业家。”

这位企业家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时代命题,我们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应当勇敢地承担起这份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基希及其报告文学》的作者T.巴克指出:“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的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报告文学的功能是怎样的呢?应该是弘扬人间正气的一首首大歌,鞭挞腐败与丑陋人性的一柄柄利剑。

潜入生活是写出精品力作的根本

□赵晏彪

部小说在曲折演进中所呈现出的文学价值和文化启示,包括时代喧嚣中的本土地域坚守、暧昧语境中的艺术立场坚守、消费漩涡中的人性价值坚守、文明等级中的文学民主坚守。”

显然,作者的内在逻辑是十分清楚的,这四个向度钩织成5章19节的结构篇章就很能说明作者的意图,有些章节阐释分析得十分精彩,是许多“边地文化”的“他者”所没有的文化审美体验的呈现与阐释。但是,他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却是我们无法解决的文化悖论和难题,这就是“文明等级中的民主”问题。

毋庸置疑,人类“文明等级”的落差造就了我们当下的“现代人”和“后现代人”看待“次文明”或“低等级文明”的异样眼光,作为一个非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我们的文学家是否能够采取另一种眼光去平等地审视你所见到的“文明风景线”呢?这就是审美的、人性的、和历史的眼光!在这里,我们需要用更多的非意识形态的理念去观察审美对象,越是异域风情的图景越是艺术世界的,更是世界艺术的。其它的一切内涵都是“次生等级”内涵的表达。如果我们的作家和研究者都是这样去看待和开发“边地文学”和“西部文学”,也许那就是“边地文学”繁荣昌盛到来之时。